

China. They may also come to admire this brave and spirited young girl who is believed to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great bodhisattva Guanyin.

CHÜN-FANG YÜ  
Columbia University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xxiii + 332. \$39.95.

中國歷史饑荒頻仍，史不絕書，故外人著書，有以《中國：饑饉的國度》為名者。遺憾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這一領域所刊布較具份量的論著，屈指可數。中國歷史上的災荒中，論災情之重、被災面積之廣，以 1876–1879 年出現於山西、直隸、河南、山東及陝西五省的華北大旱災最為突出，單是死亡人數即估計達 900 萬到 1,300 萬，其中山西一省災情尤為嚴重，估計死亡人口最高達全省之半。針對這次大旱災作較為深入的學術研究，直至 1980 年，就所見，似僅有 Paul Richard Bohr,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sup>1</sup> 以及筆者《光緒初年 (1876–1879) 華北的大旱災》兩種。<sup>2</sup> 因當日主客觀條件所限，這兩種先驅性論著對這一研究領域雖不無貢獻，但其中有待發覆之處顯然尚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研究景況大為改觀。中國大陸和歐、美學界，藉著新材料（特別是原始檔案）的發掘、新取徑的運用和新視野的開拓，饑荒研究欣欣向榮，成果豐碩。單就這兩年，二本高素質的中國饑荒史論著便相繼在美國問世，其一為李明珠教授所撰的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sup>3</sup> 另一即為本書。前書從著手研究至出版成書，歷時逾二十年，為洋洋逾五百頁的長時段研究，以原始檔案為基礎，從社會經濟史角度切入，聚焦於近三百年間直隸（今河北省）地區的災荒及抗災的歷史經驗，窮究其間的自然環境、農業資源、國家政策、社會經濟進程（如人口壓力、市場等）、人的意志等錯綜複雜的互動。與出自資深學人筆下，側重於長時段的社會經濟層面的前書相較，本書作者為後起之秀，全書所論者為發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山西大旱，透過這

<sup>1</sup>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sup>2</sup>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

<sup>3</sup>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一慘絕人寰的災變，探討這一全國性悲劇所顯示的人性及社會面相，尤著重於剖析因應這一巨創的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反響。

導言中，作者提出全書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厥為：晚清社會不同層面的人如何解釋旱災的因果關係，界定危機期間的英雄及壞人，決定備受饑饉所困的家庭成員中的汰留順序？對於這次巨災，哪些是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在華通商口岸觀察家（外人及江南地區菁英）所認為最有效結束災害的因應措置？不同的災難觀察家用以描述，並藉此說服其所要爭取的對象的文化特定形象是甚麼？旱災怎樣被留於歷史及政治記憶，並為中國大陸當政者所利用？書中各章即環繞著上述論題逐層討論。

先將內容簡介如下：前言（都柏林大學院經濟史教授 Cormac Ó Gráda 所撰）、導言及結語而外，全書分為三個部份，共八章所組成。第一部份前兩章中，作為旱災背景，作者介紹晚清山西地理形勢及早災前夕中央和地方因內亂外患的衝擊而致財力耗盡，倉儲一空而外，並以取資於山西南部幸存文人如劉姓〈荒年歌〉及梁培才〈山西米糧文〉筆下對旱災縈繞心頭的報導，生動地描述浩劫歷程。

第二部份三、四、五、六的四章中，作者對地方文士、外人、中央和地方官員、通商口岸的中國改良主義者在討論旱災時所提出的「道德焦慮語言」及「驚恐沮喪詞令」投以批評的目光，將他們對旱災因果關係各種爭論不休的解釋，置於更為寬濶的意識型態框架中，指出因其中社會、文化、地理等脈絡差異甚大，他們對旱災本身的意義的考量從而截然不同。第三章檢視地方文人記錄及地方志、石柱銘刻報導的主要關注：提供宇宙觀及道德觀的解釋架構，闡明因人心邪惡，獲罪於天而被災惹禍，並界定旱災中的地方英雄及惡棍。第四章中，作者指出華北大旱災期間清政府儘管詞令上口徑一致，表示不惜一切代價救災育民，實際上卻對於賑災與其他危機處理孰為重要，看法大相逕庭。清流派官員出自儒家理想，主張政府在賑災中應作更多的直接參與；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則力阻其轄下的專款從海防轉用於賑災，儘管李本人認識到以商人運送糧食往災區的重要，並鼓勵商人積極參與運糧。官員權力集團之間的分歧妨礙國家對旱災作迅速有效的反應。第五章表明很多在華的英國觀察家（以《北華捷報》編輯部為代表）對清政府及其賑災政策幾近嗤之以鼻。至於對災情及賑災工作具有第一手觀察的傳教士，則不像《北華捷報》那樣，以輕蔑口吻批評中國文化及官場，並在鴉片問題上，與《北華捷報》爭辯，表揚清政府在災區禁種鴉片的努力。第六章詳述通商口岸的改良主義者（以《申報》仝仁及江南菁英謝家福、經元善等為代表）對來自西方的新運輸技術和賑災方法懷有良好印象，積極地提倡加以採用，不過他們也將外人在華北放賑視為不能掉以輕心的競爭來源。

第三部份聚焦於「饑餓的符號學」或「饑餓的符象」這意念，並由此切入，用以分析災中及災後核心饑饉形象（符號、關鍵詞等文化單元）所呈現的多樣意義。第七、八兩章就「饑饉的女性化」這一議題展開討論。作者探索為何婦女往往被選作饑饉慘狀的象徵，以及旱災期間指望於中國婦女的因應怎樣被女性化的饑饉形象所型塑？第九章剖析人相食這令人深感不安的饑饉形象，其意義如何隨時代而變。

前言出自愛爾蘭經濟史祭酒、愛爾蘭大饑荒研究權威 Cormac Ó Gráda 筆下，篇幅雖僅寥寥七頁，但厚積薄發，要言不煩，從跨文化比較角度切入，點出其中關鍵議題，極具綱舉目張、畫龍點睛的作用，絕不能等閒視之。

作者從事這項研究，環境及氛圍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外學者在這一領域筆路藍縷，拓荒發軔時，不可同日而語。資料運用方面，作者除取引用大批富有史料價值，極其珍貴的教會檔案，以及督撫奏議、地方志、《光緒朝東華錄》、中外報章如《申報》及《北華捷報》等基本史料而外，並爬梳一批新的或前人未加探究的地方史料如：詩歌、石柱銘刻、民間故事和傳說、歷史小說等。她更於 2001 年 3、4 月及 2004 年 6 月兩度赴山西南部實地考察及進行口述歷史採訪。單就 2001 年那次，訪談對象包括地方史家 20 人及鄉村耆老 31 人。

作者將這些地方論述與多種跨學科的新理論取徑結合，窮究山西大旱災的多樣面相，開拓新視野，取得豐碩可喜的成果。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學界在饑荒史研究領域，特別是 1845–1849 年愛爾蘭大饑荒方面，除取資災荒史學者多所採用的人口及經濟研究外，更因汲取新分析理論如應享權利 (entitlement) 取徑、<sup>4</sup> 性別化取徑、符號分析、意識型態和跨文化比較研究等，業績斐然。西方豐富的學術資源同樣大有助於探討清季中國饑荒的人性及社會層面，書中很多富啟發性的新問題即自其中衍生。作者並不企圖藉任何一種或湊合多種理論、取徑理解華北旱災的全貌；她努力以赴的是提供不同取徑之間的對話，藉以掌握災荒各個層面的意義。

顧名思義，就全書而論，第三部份以饑餓符象為討論對象的七、八、九三章，顯為精髓所在；災荒的性別化、女性化的議題則為重心所寄。換言之，饑饉對婦女的衝擊為本書的焦點。對當日通商口岸的改良主義者及《申報》全仁利用饑饉的女性化形象，評論人口販子在災區販賣婦女，以及為了不讓中國的賑災工作落於外人之後而蒙受國恥，他們訴諸民族自尊心，從而啟動並提高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對於這一問題的公共意識，預示數十年後中國民族主義者所提出婦女解放與救國之間的強力聯繫，凡此書中都作頗為細緻的處理。作者對於饑饉中女性災民的不同形象，為當地男性目擊者（以地方文士為代表）以多種異常複雜的方式加以利用，以儒家定義期望不同生命周期的挨餓婦女呈現不同的行為：要求年輕的妻子和寡婦捐軀守貞，多數情況下老母被描寫成其他家庭成員為之犧牲的人物，女兒則置於危險境地，以至災後地方說教文本所表明，當地儒家文士及方志編纂者如何下定決心去掌控有關婦女的「記憶政治學」等方面，也有相當透徹的論述。

全書最具洞察力的或為饑饉中女性很可能比男性更能生存下來和人相食的意義等論題。當代反映於賑災宣傳運動廣為流傳的信念，厥為在婦女及兒童在饑饉期間

<sup>4</sup> 這一理論是由印裔經濟學者、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所提出的，表明饑饉多因食物分配不均，而非絕對匱乏所造成。

經常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不過作者從傳教士及外籍賑災工作者的詳盡報導中，發現女性饑饉時也比男性較有生存之道；因當日中國不均衡的婚姻市場的存在，適婚婦女長期不足，供不應求，婦女更有可能被買賣作為妻子、家僕，甚至性工具，從而脫離災區，有助於讓女性獲得更佳的生存機會；而作為處變機制，挨餓的家庭也決意出售年青的女性成員，增加其他成員存活的可能性。作者敏銳地觀察到人相食的傳聞，雖是當日巨災中的一項明顯特色，但從用以報導人相食在山西蔓延甚廣的特別形象及措辭所示，她認為很多人相食的故事、形象和信息想要描述的，或非字面上的真正意義，而可能主要是強調饑饉對儒家家庭關係施以毀滅性蹂躪的隱喻用語，也是嚴峻社會危機的強力象徵。

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取徑是本書的一項重要特色。書中焦點當然為清人對光緒山西大旱災的討論，但也與十九世紀英國人對中國、愛爾蘭及印度大饑荒的解讀相對比，探討文化賦予饑饉的意義。就《北華捷報》對光緒初年華北大旱災的報導所見，惹怒外人的莫過於官方賑濟的作風。該報將食物短缺蛻變為巨災再三歸咎於三個因素：(一)清政府干擾自由貿易；(二)以工代賑付之闕如；(三)政府不願修築鐵路及其他現代形式的運輸工具。該報論點正反映其意識型態所信奉的十九世紀自由貿易及放任經濟。事實上，這一主張對十九世紀英國治下的印度及愛爾蘭受饑饉所苦的公民聽來耳熟能詳。不像晚清那樣，英國在印度及愛爾蘭的決策人及賑濟官員堅持不干預政策，拒絕國家對養活人民應負家長式責任。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愛爾蘭備受饑饉蹂躪的頭兩年，英國掌政的自由黨政府強烈反對愛爾蘭進口便宜糧食及阻止食糧從愛爾蘭輸出，視之為不恰當的干擾正常貿易。1876 年底 Madras 省當局鑑於食糧短缺，糧價陡升，向印度政府報告業經商定購儲三萬噸穀物。印政府以干預私人貿易為理由，推翻這一計畫，並視為危及近乎完美的不干預政績中的一項瑕疵。

英國觀察家對清政府在賑災工作中免費發放食物及現金感到大惑不解。《北華捷報》一篇社論力持「政府職責在於提供工作，而非食物」，誇耀英國在印度賑災中以工代賑的成功業績。該報所反映的正是十九世紀英國官方的意識型態：自由黨人儘管鼓吹賑濟，但更將自力更生看得高於一切，認為印度及愛爾蘭的窮人都是懶惰及過度依賴的；走投無路的愛爾蘭及印度的饑饉難民應致力於公共工程項目，換取食物或勉強餬口的工資。儘管在華英人對英國在印度等地的抗災工作津津樂道，卻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十九世紀中葉部份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即宣稱「愛爾蘭死於政治經濟」多於可預防的糧食短缺，而印度在 1876-1879 年饑荒的死亡人數估計在 610 萬至 1,300 萬上下。這樣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既豐富中國災荒史研究的內容，也為這園地開拓新視野。

本書或為目前最能呈現清季山西大旱災全貌的專著，書中所論幾乎觸及當日大災難中的各個層面。作者自言，討論範圍包括創傷與記憶、民間傳說、倉儲及糧食運輸路線、晚清山西的階級關係、國家意識型態、災荒因果關係理論、鴉片種植、北京派系政治、販售婦女、危機期間性別及家庭關係、饑饉人口學、人相食、報紙

對災難的報導、飢餓的視覺形象描畫、江南施善傳統、中國原民族主義和通商口岸的改良主義運動等。筆者拜讀本書後，知作者所言非虛。難得的是，儘管本書牽涉的層面甚多，但沒有蔓生枝節、流於空泛而失焦，始終將論述奠基於災難這核心問題上，環環相扣，實為從小處入手、大處著眼的極其成功範例。

作者聚焦於清季山西大旱的同時，並沒有忽略大旱的現實意義。作者將清季旱災故事延伸至今日中國大陸，指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躍進災難時，山西地方史家故意將八十年前山西地方文士所描述的駭人聽聞事件，歸咎於貪婪的官員及吃人的「舊封建社會」；這與英明領袖治下新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民處災不變，恰成鮮明對比。結語中，作者以當前專為到山西平遙城牆參訪遊客演出的一齣生動有趣、有關清季山西大旱災的戲劇作引子，剖析戲劇怎樣以暗示廿一世紀中國所關注的方式，解釋當日的巨災。從最近五十年間的前後演變，讀者不難掌握其間世變的脈動。

閱讀所見，書中有小誤或可資商榷者，如：頁 6 行 17，Premier Jiang Zemin，因江澤民職位為國家主席而非總理，改為 President 較妥。頁 140 行 9 及頁 280 注 13，Jing Yuanshang 經元善，應作 Jing Yuanshan。頁 166-68，頁 286 注 15、16、17，Guoju 郭巨，改作 Guo Ju 較妥。頁 171 行 17-19，From Queen Possu, whose refusal to smile was blamed for provoking King Yu to play tricks that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Queen Possu 應作 Queen Baosi，King Yu 應為 King You，Eastern Zhou 當為 Western Zhou 之誤。頁 246，中英對照表部份，故關當作固關。頁 254 第一章注 8，Ibid. 疑為 Li Sui, *Jinyou riji* 之誤；注 15，Ibid.，資料來源疑誤。

本書要處理的並非一個原創性新課題，但舊瓶新酒，內容推陳出新，饒具勝義。作者感性、理性兼具，盡可能設身處地，融入實況，描畫並分析災荒涉及的多層意義和複雜面相，以及危機對當日社會不同階層所引出的多樣反應。在清季山西大旱災研究的領域中，無論就深度及廣度而論，本書超越前修，後來居上，毋庸置疑。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